

X 主编◎吴雁南 冯祖贻
Zhongguo 苏中立 郭汉民
jindaishehuisichao

第二卷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由于西学的东渐，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文化挑战。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涌现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形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近代社会思潮的云涌风发，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之积极精神的高扬，努力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新路。



主 编

吴雁南 冯祖贻

苏中立 郭汉民

中国近代 社会思潮

1840—1949

第二卷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

第二卷

吴雁南 冯祖貽 苏中立 郭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刘新民 胡本昱

责任营销：方 民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228411705@qq.com

客 户：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国防科大印刷厂印刷

710×1050 16开 印张：38 字数：484000

1998年8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2591-8

定价：45.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顾问及题词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囊括了近代的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观点明确，资料丰富，分析深入，表述清晰。书中创新之处颇多，是学术界的一部力作。

戴 逸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起伏跌宕，异彩纷呈，反映了近代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社会变革的急剧深刻。

李文海

历史浚发人的智慧。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提供借鉴。

耿云志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规模宏大，史料丰富，论证严密，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轨迹，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对史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宪文

本书系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主持的国家“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课题最终成果，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本卷主编 苏中立

副主编 赵 泓 曾光光

本卷执笔者

本卷导论 吴雁南

第五编 第一章 刘 伟 杨正喜

第二章 苏中立

第三章 陶季邑

第四章 袁为鹏

第五章 邹小站

第六章 王 劲

第七章 赵 泓 王 劲 刘 伟

第六编 第一章 涂光久 苏 铭 王 放

第二章 王国宇

第三章 赵 泓

第四章 冯祖贻

第五章 徐 扬

第七编 第一章 郭汉民 邹小站

第二章 刘圣宜

第三章 王荣国

第四章 王荣国

第五章 吕美颐 吴效马

第六章 严昌洪

本卷导论

一 民初社会剖析

民初社会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五四运动近 10 年间，是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充满着斗争、变革、动荡、曲折和反复。潮起潮落、奋争与顿挫、民族的苦难与激越的悲歌相交织。长期以来，人们回顾这段历史，过多地强调了革命的失利、国家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对这段历史在近代中国大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却注意得不够。

从戊戌维新算起，先进的中国人把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改造运动提到历史日程，辛亥革命在更大规模上掀起改造中国的运动。然而真正将中国近代化的措施付诸实践的，主要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尽管辛亥革命遭到挫折，但它建立起来的共和政治却标志君主专制政治形态的结束。袁世凯称帝、张勋的复辟，都遭到唾弃，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民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民主自由，但谁也无能力去拆掉“共和”这块牌子。不论当时的政治距离真正的民主多么遥远，争得民主自由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毕竟从此开始了向民主共和政治的过渡。辛亥革命及此后的斗争虽屡遭挫折，却锻炼了矢志于振兴中华的英雄志士，并给人们树起了一面指向光明的旗帜。中国的宪政建设虽步履维艰，宪政精神却因人心所向而得以维继。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却是中国近代宪政建设的真正开端。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国近代的政治民主化建设尤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民国成立，百度维新。不仅提高了“四民”之末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而且让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参与国政。不仅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得到法律保护，而且得到新生的共和政府的鼓励。临时政府宣称：“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不能不切实经营，已成者当竭力保存，未成

者宜先事筹划。”^① 即使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也表示要重视实业建设。特别是在刘揆一担任袁世凯工商总长任内，始终把推行经济改革、发挥资产阶级在实业建设中的作用放在首要地位，以“工商立国”相标尚，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他强调说：“吾国今日救贫，即所以救亡，工商实业，采保护政策，即所以救贫。国民与政府合为一气，立一定不易之方针，树百年不拔之基业，是则余所馨祷祝以求之者也。”^② 其后，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在经济立法、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亦做了许多努力。这都有利于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特别是孙中山同黄兴等革命党人，致力于振兴实业、实业建国，号召人们着力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③。实业团体、宣传实业的报刊，随之不断涌现。1915年，全国的实业团体达100多个，新创办的实业报刊计50多种。“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④的呼声，推动着振兴实业的热潮迅速兴起。涉足实业的，不仅有资本家、华侨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而且有军阀、官僚。加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利环境。从1914年开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出现了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新设厂矿370多个，投资总额8600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投资额更远远超过此数。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50~60万人，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发展到200万人左右。其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在此期间，中国工人不仅罢工规模有所扩大，而且迅速地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在上海、广州、武汉、南京、唐山、湖南、四川等地都出现了早期工会组织，有的

①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页。

② 刘揆一：《工商政策》，《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③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④ 《工业建设会趣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2页。

还提出了不准资本家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觉悟的提高,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精神鼓舞下,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举世瞩目的促进中国文化转入新轨的新文化运动,而且近代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事业也都得到很大发展。先后于1912年、1919年进行的教育改革,使传统教育进一步向近代教育转型,尤其具有深远意义。

由此可见,从辛亥至五四的民初10年间,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化建设大转型的真正开端,而且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准备了条件。正如李大钊所说,那正是处于“旧稂之黄昏已去,新稂之黎明将来”的历史的转折关头,是血性男儿“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的年代。人们在悲歌激越中充满信心,“日日迎黎明之朝气”。^①研究民初10年的历史,必须从社会历史变革与发展的总体上进行剖析。

强调民初社会在历史转型中的重要位置,强调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觉醒的历史转型时期,并没有丝毫忽视反动势力的猖狂、中华民族灾难的深重、复辟倒退逆流的严重。众所周知,当举国上下还沉浸在推翻清朝、结束封建帝制、创建共和的欢乐气氛之中时,中外反动势力却开始了向革命的反扑。先是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窃取共和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继则刺杀革命派重要领导人宋教仁,步步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为挽救共和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不仅恣意破坏民主制度,建立专制独裁制度,而且复辟帝制。袁记洪宪帝制的破败、稍后的张勋复辟的昙花一现,固然反映了逆潮流而动者必遭灭亡;但是,军阀统治的政治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天加深,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苦。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复古倒退的逆流。历史出现了大反复。中华大地出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象。

但是,民气未灭,中国社会的新因素在孕育成长,1919年的五四运

^①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页。

动成为中国历史的真正契机，开始谱写着新的篇章。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从辛亥到五四的一切变革、奋争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就很难在五四时期出现新的历史契机。

问题是：在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出现历史的大反复？

从民初政治看，政党的名目虽多，但就其主要政治倾向而言，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

第一种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袁世凯从来没有认为在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武昌起义后，为了夺取大总统职位，曾假意赞成共和。他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步步破坏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采用各种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逐步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并力图恢复帝制。袁氏死后军阀主宰中国的局面仍然没有变化。

第二种是以张謇、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从阶级属性而论，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但就两派的民主性而言，同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系而言，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联系而言，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宏观看，立宪派虽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一翼的政治代表；实际上其阶级基础是相当复杂的，它不仅包括已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而且也包括正在转化的地主、官僚和商人以至开明士绅。由于立宪派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较多较深的联系，武昌起义前，长期同革命派对立，反对革命；武昌起义后，虽“咸与维新”，不少人表示“拥护共和”，却在新形势下继续同革命派争斗，力图恢复其旧日之势力，成为拥袁势力。后来他们虽曾对袁氏恢复帝制不满，以至有人拍案而起，反对帝制，但他们却拥护袁世凯身后的北洋军阀。李剑农曾说：“梁氏相信国家要有一种中坚实力来维持，北洋派的武力有可以成为中坚实力的资格；很想和他们结合去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不成功；现在想改良冯、段。”^①

第三种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当时进步的社会力量。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425页。

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内部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民立报》的言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对袁世凯要“监督与匡助并行”，在维护袁世凯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政党竞争、责任内阁等，把中国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①。这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主流派的思想主张。以《民权报》的言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却认为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革命已经失败。痛斥袁世凯是“共和之敌，国民之贼”^②，要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他们没有获得重要实权，其见地与主张，不容易付诸实践，无力扭转局势。但总的看，他们也还是依靠合法手段防止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继续奋斗，其内部虽有对袁世凯采取“急进”与“缓进”之分，在反袁、革命这个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无论此后的斗争怎样遭到挫折，却夙夜匪懈、始终一贯地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奋争。

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三种社会势力在较量中的社会基础，即会惊异地发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社会基础相当薄弱，甚至在许多重大的斗争中得不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1980年笔者在一篇文章里曾论及辛亥革命的早熟性，并初步论述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③

从辛亥革命到民初中国的社会经济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十分薄弱。1872年至1911年间，中国民族资本所创设的较大厂矿为520家，资本为15955万多元，同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相比，是很微弱的。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记载，1912年全国钱庄和典当业资本为16000多万元，而全国工业资本则仅5500万元左右。这种从属于封建经济的钱庄和典当业势力大大超过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情况，就足以证明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为微弱。如果把这种情况同法国革命前夕的经济情况相比，更可看出辛亥革命前夕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未成熟。虽然，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工业处于手工工场阶段，但这种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已在法国工业中起着主导作用。资本主义生

① 血儿：《毋受愚》，《民立报》，1912年4月22日。

② 《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

③ 参见吴雁南：《辛亥革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转刊《新华文摘》，1980年第12期。

产关系已深入农村，资产阶级占有的土地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二十。这表明，在法国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确立。斯大林曾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还在公开革命发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成熟了。”^① 然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远未成熟时就爆发了。在民初 10 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由于整个民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更谈不上支配国民经济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② 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还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封建剥削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占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③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薄弱更不待言。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薄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很弱，清末民初尚未革命化。从总的看，它同立宪派的关系比较好一些；同革命派却很疏远，甚至持反对态度。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夜，中国民族资本家在 1 万元以上的只有 200 多家，其中 100 万元以上的仅有十几家。一些资本家还向国外银行借贷周转资金。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其革命程度同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相差得很远。以辛亥革命首义的武汉地区为例，在 40 多家民族工业资本家中，没有一人参加革命派的活动；在六七千户商人中，也只要一二人参加。^④ 在法国，18 世纪末，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经济上最有实力的阶级了。它集中了巨额的资本，掌握了国内工业企业，控制了国内外贸易。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权的地位，使得它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极其尖锐。1789 年“三级会议”的召开，更加强化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程度，紧接着他们在这年 7 月发动了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风貌。同他们相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大为逊色，后者犹豫动摇，顾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 年版，第 178 页。

② 参见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00～209 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30 页。

④ 武群文：《辛亥革命前武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江汉学报》，1961 年第 4 期。

虑重重，对革命的态度暧昧以至站在对立面。然而，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表现出相当可贵的革命热情，成为时代的先锋。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这个进步阶级同它的政治代表在言行上的反差。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少地区的商团对革命持积极支持态度，其中以武汉、上海尤为突出。但为时不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却为之一变，从对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采取不合作不支持态度，到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在革命与反革命鹿死谁手的大决战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虽然，资产阶级远离革命派，并在关键时刻站到了反对革命的一边，但它却非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势力的真正支持者，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危及其利益时，即又同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决裂，起而支持护国反袁斗争。以上种种表现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实随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进退而进退；其与革命派、袁世凯的态度，大体与立宪派相似。对此，朱英做了可贵的探讨^①，以上意见虽与他稍有出入，却吸取了他的宝贵意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持这种态度？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原因，究其根本原因只有一条，从其本身发展的程度而言，在政治上只能接受君主立宪。上文曾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同法国粗略比较，在此不妨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作一比较。众所周知，革命前的英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城市人口只占全英人口总数的1/5。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突出特点却是资本主义深入乡村。从16世纪起，英国呢绒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手工工场日益增多，其规模亦不断扩大。英国的东、西、北部已成为呢绒工业的中心地区。呢绒出口占全英出口总额的90%以上。同时，在冶金、造船、采煤、玻璃等新兴工业中也普遍建立了手工工场。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而且使英国的贵族分化为新、旧贵族。新贵族虽保有贵族的头衔和特权，却迫切要求改变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在反对英国封建统治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新贵族结成联盟。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各种反封建的社会力量逐渐集合在反封建的旗帜下，革命条件逐

^① 参见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渐成熟。1640年开始的革命从其展开之日起,就显示出相当大的威力。经过反复较量,英国终于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同当年的英国相比,实难等量齐观。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支持君主立宪,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正是因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幼弱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具有早熟性,思想启蒙十分不足,广大民众尚处于沉睡之中,缺乏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中国封建社会达两三千年之久,封建思想文化不仅支配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观念和意识,而且浸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严重阻碍着人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既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又没有深入地批判中国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即使像孙中山那样学习西方的伟大人物,在他的言论中也是“批资”多于“批封”;更有人提出所谓“复兴古学”,企图演出历史的新局面,在其论著里呈现出浓烈的崇古气息。革命派在宣传其政治纲领中,过分地强调和渲染“反满”斗争,对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均地权的主张,并未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和系统深刻的论证。加上,近代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家,尽管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少数农民受到革命运动的某些影响,而绝大多数农民尚未觉醒,对政治仍极为淡漠。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革命党重要人物胡汉民,1912年曾说:“共和国之主权在民,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实居大多数,更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①沿海地区尚且如此,内地闭塞的乡村更是可想而知。五四时期在中华大地兴起了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上述情况却未因此而基本改变。四川盆地中心地区的长寿县,1942年刊行的县志记载,当时人们“相聚而谈不离孝字,如尔想尔身从何处来,十月怀胎娘辛苦,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等语。……壮年望子,惟他日无人送老归山、香火断绝为虑”^②。由此可知,辛亥至五四的民初10年间,中国的社会思想虽有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很不平衡,基本上处于“精英在觉醒,

① 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版。第26页。

② 《长寿县志》卷四《风土·礼俗》。

民众在沉睡”的状态。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或者说是绝大多数仍旧处于沉睡之中——“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这种情况的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历史的大反复，主要决定于民初的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关系与政治结构、广大民众的沉睡状态。

综观民初10年的历史，一方面是中国社会新的转型的诸多因素在孕育成长，另一方面是复辟倒退逆流的猖狂，历史的大反复不仅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开始产生怀疑，而且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着新的探索。那时候，国际上亦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剧变，资本主义世界经过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险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如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升起。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俄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出现了新的觉醒。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宣告了中国历史即将出现新的契机。

二 民初社会思潮的特点

（一）爱国主义风雷激荡，催促着人们走向新的觉醒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学习西方，改造中国，成为一代代志士仁人奋斗的主题歌。甲午中日战争后，改造中国的运动逐渐高涨，先是举世瞩目的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原大地兴起，继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帝制，创建了民国，取得了很大胜利，然而其政权却被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所窃取。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清朝，创建了共和政体，国家就可以富强，人民就能够得到幸福和安乐，出现一个太平世界。谁知，事与愿违，国家的处境一天天险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决定承认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中国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军阀反动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出卖民族主

权，国运多舛，变乱相寻。这都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恨。当人们得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时，群情激愤，奔走呼号。“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的吼声震动天地。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反袁的爱国运动。此后人们无不把讨袁护国、反对张勋复辟与护法斗争，同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投袂奋起振危亡。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勾结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外交大失败警耗”，更使亿万中华儿女义愤填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收回山东权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怒吼声，震动北京，震动全国。5月4日北京学生的爱国示威反映了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心声，立即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顷刻间，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民众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标志着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从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卷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斗争的，包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爱国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想潮流。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历史等待着新的契机，在民国初年的最后年月中国革命已开始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觉醒。这表现在：

第一，辛亥革命后，人们在反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倒行逆施、卖国求荣的斗争中，异军突起，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开展猛烈的进攻。早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没有超过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却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引向深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给腐朽的封建主义以有力的冲击，启迪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励人们冲破旧思想的牢笼，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形成了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后又开始了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播。这就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从而赋予了新时代的新内容。

第二，辛亥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继清末社会主义探索之后，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中国社会党的创立，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中华民国工党的倏起倏落，蔡大愚之“宣传共产”，殷

仁之崇尚马克思之“集产社会主义”，要求创建平民社会党，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以创建民国的伟人的身份，四处演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批判，指斥资本家“无良心”，揭露美国政治的腐败，对劳动群众表现出真挚的同情。在呼唤社会主义的人群中，虽混有政客、投机分子，亦不乏真诚的爱国志士。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虽非科学社会主义，却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

第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了东西文化的论战。其后又围绕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进行论争。历史的潮流有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守旧的人们的故步自封，却无力阻止当时西方各种社会潮流的纷至沓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涌来的新思潮中，既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说，又有各种派流的社会主义。一时间，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验主义、地方自治、妇女参政、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主义不一而足；清末民初呈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围绕着振兴中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牵系人们心弦的头等大问题，开展讨论、争鸣与论战。经过比较、研究甚至于个别小范围的实验（如新村主义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国人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报导了中国人民已开始走向新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开始迈进一个新的阶段。

（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旧是当时巨大的社会思想潮流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曾先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华大地掀起学习西方，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封建专制主义的浪潮。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同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所标尚的旧民主主义，成为时代的旗帜。辛亥革命的失败，虽然有人灰心丧气，不知从何处寻求解放祖国，求得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方案，但是，反对复辟倒退的护国、护法等一系列斗争，都是以维护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革命成果、所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法制而奋斗。1915 年在反复辟斗争中突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初期亦只局限在民主主义范畴。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